

紅學與百年中國

• 劉夢溪

引子

我所說的百年中國，是指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也就是清末民初以來的中國社會，至今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。《紅樓夢》裏敘述賈家的來歷，說自國朝定鼎以來，赫赫揚揚，已歷百載。國朝定鼎指的當然是清兵入關，是為1644年，至曹雪芹寫作《紅樓夢》，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評本，已稱批閱十載、增刪五次，由此上推十年，是1744年（約為雪芹撰寫是書的時間），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。而《紅樓夢》研究，如果從1904年王國維發表《紅樓夢評論》開始，至今也快有一百年的歷史了。

這一百年的中國，鬧鬧嚷嚷，不可終日。這一百年的紅學，也是鬧鬧嚷嚷，無有竟時。《紅樓夢》裏〈好了歌〉註——「亂哄哄，你方唱罷我登場，反認他鄉是故鄉」，是百年中國的寫照，也是百年紅學的寫照。杜甫

詩：「聞道長安似奕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。」陳寅恪亦有詩云：「一局棋枰還未定，百年世局不須論」、「遙望長安花霧隔，百年誰覆爛柯棋。」^①百年中國的事情許多都說不大清楚，百年紅學的事情又何嘗說得清楚？潘重規先生寫過《紅學五十年》、《紅學六十年》，我本人寫過《紅學三十年》。現在該有人來寫《百年紅學》了。

上篇「遙望長安花霧隔， 百年誰覆爛柯棋」

百年紅學，都有些甚麼值得記憶的事情呢？這裏用得上《紅樓夢》第六回作者自敘結構之難的一句話：「按榮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來，人口雖不多，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，雖事不多，一天也有一二十件，竟如亂麻一般，並無個頭緒可作綱領。」百年紅學的事情，比榮府的家政要複雜得多。只好舉其突出之點，略志梗概。

中國傳統學術可以說有道德傳統，少知性傳統。但是到了晚清，是時學人產生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性，並試圖用新的學術觀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學術，尋求新解。

我想，關於百年紅學的事情，至少要有六個方面的故實值得注意。

第一，中國現代學術是以《紅樓夢》研究開其端的。中國是學術大國，傳統學術經歷了先秦子學、兩漢經學、魏晉玄學、隋唐佛學、宋明理學、清代樸學、晚清新學等不同的發展階段。至清代樸學，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學術的一些萌芽。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傳統學術和現代學術的分野出來，一是學者是否把學術本身當作目的；二是學術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識論的因素摻入。中國傳統學術是不重知識論的，也可以說有道德傳統，少知性傳統。但到了清中葉，傳統學術的道德傳統有了向知性傳統轉變的跡象。章太炎稱清儒的治學方法有六：一曰審名實，二曰重佐證，三曰戒妄牽，四曰守凡例，五曰斷情感，六曰汰華辭^②。把斷情感作為治經的六法之一，說明傳統學術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經在一定的意義上發揮作用。而按照梁啟超的說法，盛清學者的獨異之處，是具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^③。因此我們說中國學術至清中葉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學術的萌芽，是可以得到理據支持的。但這也只是萌芽而已。真正開現代學術之端還是在晚清，是時歐風美雨襲來，學人產生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性，並試圖用新的學術觀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學術，尋求新解。

這一轉變的時間約在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。1898年嚴復發表《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》，1902年梁啟超發表《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》和《新史學》，1904年王國維發表《紅樓夢評論》，其間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規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^④。就中尤以王國維的《紅樓夢評論》最具學科的

代表性，是學術史上文學評論一門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觀念和方法，來研究中國古典。在時間上，《紅樓夢評論》比蔡元培的《石頭記索隱》早十三年，比胡適發表《紅樓夢考證》早十七年。如果說王、蔡、胡分別為紅學的小說批評、紅學索隱、紅學考證建立了學派的典範，那末王靜安先生的《紅樓夢評論》不僅為紅學的小說批評建立了典範，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義。

第二、回顧百年以來的紅學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特異的現象：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，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紅學。有的是自覺捲入，有的是被迫捲入，有的是不知不覺的誤入。除了王國維之外，蔡元培、胡適之、陳獨秀、顧頡剛、俞平伯、吳宓等，都寫過研究《紅樓夢》的專著或單篇論文。五四前夕，吳宓、陳寅恪、湯用彤、俞大維在哈佛留學，當時中國學生會曾舉行過學術聚會，請吳宓講《紅樓夢》，後來這篇演講以《紅樓夢新談》為題，在刊物上公開發表。演講時間為1919年3月2日。3月28日陳寅恪為這次演講題詞，寫了一首七律^⑤：

等是閻浮夢裏身，夢中談夢倍酸辛。
青天碧海能留命，赤縣黃車更有入。
世外文章歸自媚，燈前啼笑已成塵。
春霄絮語知何意，付與勞生一愴神。

吳宓和陳寅恪發表對《紅樓夢》的見解，也都在1921年胡適發表《紅樓夢考證》之前。1945年吳宓在成都時曾寫過《紅樓夢》系列論文，連載於《流星》、《成都周刊》等雜誌。直到晚年，吳宓仍以對《紅樓夢》有特識獨見自居。陳寅恪的著作中，也每以《紅樓》

回顧百年以來的紅學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特異的現象：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，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紅學。有的是自覺捲入，有的是被迫捲入，有的是不知不覺的誤入。

為喻，增加理趣。

陳獨秀也寫過研究《紅樓夢》的長篇文章，在1920年出版的《小說月報》上發表，題目是〈紅樓夢新評〉，署名佩之。蔡元培的《石頭記索隱》，是索隱派紅學的典範之作。胡適的《紅樓夢考證》，是考證派紅學的典範之作。胡、蔡論戰，是本世紀20年代學術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。《紅樓夢》以及紅學的影響的擴大，實際上與這次論戰有很大關係。胡適批評蔡元培的《索隱》是「牽強附會」的「猜笨謎」，蔡元培回答說：「胡先生所謚為笨謎者，正是中國文人習慣」，並謂《紅樓夢》的內容很「值得猜」。胡適對此起而回應，並在文章結尾處申明：「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，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朋友了。」論戰雙方觀點截然對立，措辭亦相當尖銳，但態度溫婉忠厚，不失學者風度。

王、蔡、胡都是當時的學術重鎮，他們出面大談紅學，影響是很大的。俞平伯先生1978年寫的〈索隱與自傳說閒評〉一文，其中有一段頗值得我們注意。他寫道◎：

紅學之為譚名抑含實義，有關於此書之性質。早歲流行，原不過紛紛談論，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「學」也。及清末民初，王、蔡、胡三君，俱以師儒身分大談其《紅樓夢》，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。

「師儒」一詞，顯然用的是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「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為老師」之義。應該承認，俞平伯先生對紅學之所以為紅學的歷史過程的辨析，是很有見地的。於此也可見第一流的學者參與或捲入

紅學，就學科的樹義而言具有怎樣的學術典範意義。事實上，在王、蔡、胡的影響之下，參與或捲入紅學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者還有很多。連現在已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，在30年代也曾發表過專業性很強的研究《紅樓夢》的長篇論文，題目是〈紅樓夢悲劇之演成〉，連載於1935至1938年出版的《文哲月刊》。此外，古文字學家容庚，敦煌學家姜亮夫，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，唐史研究專家唐長孺，社會活動家王昆侖，文學史家鄭振鐸、阿英、李長之、劉大杰等，都寫過有關《紅樓夢》的專文或專書。

至於50年代以後，躋身於紅學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。翦伯贊、鄧拓、郭沫若、王力、郭紹虞、韓國磐、傅衣凌、程千帆、鄭朝宗等等，一口氣可以舉出一大串名字。而且不包括專

自蔡元培(圖)與胡適對《紅樓夢》熱烈討論後，紅學已成為本世紀中國文人的顯學。



詩人、作家的介入紅學，打開了《紅樓夢》的另外一個世界，即藝術創造的世界，使本來容易流於枯燥的學術研究插上了藝術創造和藝術感悟的翅膀。

門研究古典小說的學者。我使用的是賈寶玉提倡的「疏不間親」的原則。另外旅居海外的趙岡教授以經濟學家的身分寫出《紅樓夢新探》，余英時教授以史學家和思想史家的身分撰寫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。柳存仁、周策縱、唐德剛三位先生，早已被視為《紅樓》「夢」裏人，但他們畢生治學，另有偉績，重點絕不在《紅樓》。潘重規先生固然以紅學名家，但其研究敦煌學和文字學的成就，早為學術界所矚目。馮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頗治紅學，同時也治藝術考古和譜牒之學。最近，旅居北美的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也對紅學發生了興趣，撰寫了一篇近三萬字的論文，汪榮祖先生推薦給我，已發表在《中國文化》第十期。我的初步印象，這是近年來《紅樓夢》研究領域裏難得一見的重要文章，相信出來後，紅學界會有相當的反響。

第三、許多知名作家的介入紅學，為百年來的紅學研究增添了色彩。當然，中國現代作家很少有不熟習《紅樓夢》的。我所說的介入，是指發表過研究《紅樓夢》的專著或專論。沈從文、魯迅、巴金、沈雁冰、冰心、張天翼、吳組緝、周立波、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說家，都寫過重要的《紅樓夢》文章。詩人何其芳寫於50年代的《論紅樓夢》，更是代表一個時期學術水準的紅學專論。詩人徐遲也著有《紅樓夢》的專書。林語堂的專著《平心論高鶚》、清宮小說家高陽的《紅樓一家言》，人們都非常熟悉。高陽先生不幸作古，他的關於《紅樓夢》的奇思儼論，足可以給常常固執一端的紅學界帶來刺激和啟迪。女作家張愛玲出版過《紅樓夢魘》。另外散文、戲劇家，錢鍾書先生的夫人楊絳，也寫過重要的《紅樓夢》論文，題目是

〈藝術是克服困難〉，乃於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。楊絳以作家的身分兼通中外文學，她選擇淵源研究、比較研究的視角撰寫此文，使其成為非常規範的比較文學論文。錢鍾書先生雖然沒寫過專門的《紅樓夢》文字，但所著《管錐編》、《談藝錄》兩書中，引證《紅樓夢》處俯拾可見。詩人、作家的介入紅學，打開了《紅樓夢》的另外一個世界，即藝術創造的世界，使本來容易流於枯燥的學術研究插上了藝術創造和藝術感悟的翅膀。

近年在中國大陸，又升起了兩顆以作家身分研究《紅樓夢》的新星——王蒙和劉心武。1991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蒙的15萬字的紅學專著《紅樓啟示錄》，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寫成的，當時作者住在醫院中。成書之前，單篇文章曾披載於報刊，讀者爭相傳閱，一時洛陽紙貴。作家宗璞為《紅樓啟示錄》作序，稱讀王蒙的紅學文字「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薰風之感」。她說這「的確是新星，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這領域，而是因文章確有新意，是以前研究者沒有寫出，讀者沒有想到，或可說雪芹也沒意識到的」。讀過王著的人會認可這一評價，不會認為是作家之間的調侃溢美之詞。《紅樓啟示錄》第一版印行一萬冊，不久再版、三版，現在已經印行五、六萬冊了。劉心武對《紅樓夢》中的人物有別出心裁的理解，他發表在《讀書》雜誌上的〈話說趙姨娘〉一文，頗有可讀性。後來還作起了紅學考證，提出「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」，文章發表於《紅樓夢學刊》，周汝昌撰文呼應，在讀者中有較大的反響。

第四、百年來的《紅樓夢》研究表

明，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的變端有一定的關係。何時《紅樓夢》研究變得熱門，往往有具體的文化背景。1898年，戊戌變法失敗之後，有人寫了一首詩：「說部荒唐遣睡魔，黃車掌錄恣搜羅。不談新學談紅學，誰是蝸廬考索多。」詩後有小註寫道：「都人喜談石頭記，謂之紅學。新政風行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，康、梁事敗，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。」^⑦這說明《紅樓夢》研究有自己的現實關注點。1921年，胡適之、俞平伯、顧頡剛通信討論《紅樓夢》，俞在給顧的信中說：「京事一切沉悶（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），更無可道者，不如劇談紅樓為消夏良方，因此每一執筆必奕奕如有神助也。」^⑧「劇談紅樓」的雅興，使他們躲開了不忍觀的現實關注點。今天的《紅樓夢》研究和社會變端是否仍然存在甚麼關係，我不敢斷言。但我模模糊糊的意識到，凡是《紅樓》走紅、全社會大談《紅樓》、紅運上升、紅潮洶湧的時候，似乎並不是甚麼大吉大利之事，常常國家民族的命運在此時卻未必甚佳。紅運和國運似乎不容易兩全——不知我這樣說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。

第五、百年紅學，大故迭起，波詭雲譎，爭吵不休，是學者們打架打得最多的領域。我在《紅學》一書中，有一專章敘論紅學論爭和紅學公案。我舉出十七次論爭、九樁公案，還不免掛一漏萬。這一章的題目，我稱做〈擁擠的紅學世界〉。而且紅學論爭格外牽動人們的感情。清末資料記載的因對寶釵、黛玉的評價不同而「幾揮老拳」的傳統，看來是承繼下來了。一些客串紅學的學者，問題還不大。以紅學為本業的人，爭論起來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。而且紅學論爭絕不以

地域為限，哪裏有中國人，哪裏讀《紅樓夢》，哪裏就有論爭。大陸固不必說，台灣、香港以及北美的論爭，即使沒有更勝一籌，也絕不相形見绌。

如此激烈的紅學論爭，使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，擔心一旦陷進去，無以自拔。余英時先生就說過，《紅樓夢》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。李田意先生也說，斬不斷，理還亂，是紅學。詩人邵燕祥寫過一篇文章，題目叫〈怕談紅樓〉。我本人也幾次聲明，從此洗手不幹了。我主編的《中國文化》雜誌，決計不輕易發表有關《紅樓夢》的文章。近年我一直在逃離紅學，沒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寶島，參加的又是《紅樓夢》的會議。這只有用「在劫難逃」四個字來形容了。

第六、近百年來的紅學所以為人們關注，且仍保持着學科的生命力，與不斷有新材料的發現有很大的關係。胡適起而與索隱派紅學論戰，憑藉的就是新發現的《紅樓夢》早期抄本，一個是甲戌本，一個是庚辰本，上面有署名脂硯齋、畸笏叟的許多批語，透漏了一些曹雪芹寫作《紅樓夢》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況。隨後又有大量清宮檔案的出世，對曹雪芹的家世和親戚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了。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發現。對一門學科來說，新材料的發現，是這門學科設立的先決條件。王國維氏嘗言：「古來新學問起，都由於新發見。孔子壁中書出，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。有趙宋古器出，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、古文字之學。」^⑨陳寅恪也強調：「一時代之學術，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問題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。治學之士，得予於此潮流者，謂之予流

百年來的《紅樓夢》研究表明，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的變端有一定的關係。凡是《紅樓》走紅、全社會大談《紅樓》、紅運上升、紅潮洶湧的時候，似乎並不是甚麼大吉大利之事，常常國家民族的命運在此時卻未必甚佳。

紅學研究中有「三個死結」：一是芹係誰子，二是脂硯何人，三是續書作者。這三個問題，根據已有材料，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說不知道。

現在國內的紅學，多少有一點「禮失求諸野」的味道。比如多種版本的《紅樓夢》電影、電視連續劇的相繼問世。又比如現在中國大陸，南北都在大建大觀園。紅樓服飾、紅樓宴大興其時。我認為紅樓文化固好，但要避免俗世化。

(借用佛教初果之名)。其未得予者，謂之未入流。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，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問喻者也。」^⑩《紅樓夢》背景材料的一再發現，為紅學研究開拓了新的區域，所以有脂學出焉，有曹學出焉。事實上，後來的紅學研究，已擴大到整個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，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跨學科的特點。因此現代學術史中的紅學一目，才有那樣強的生命力，那樣大的吸引力。

但隨即發生一個問題：檢討百年來的紅學，研究者對《紅樓夢》本文的研究反而有點忽略了。另一方面，新材料的發現，總是極為偶然的。對已有材料的詮釋，到一定時期也會達到一個極限。所以，儘管研究隊伍如此龐大，不時成為學術熱點的百年紅學，所能達成的一致結論並不很多；相反，許多問題形成了死結。我曾說紅學研究中有「三個死結」：一是芹係誰子，二是脂硯何人，三是續書作者^⑪。這三個問題，根據已有材料，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說不知道。當然，以後如有新材料發現又作別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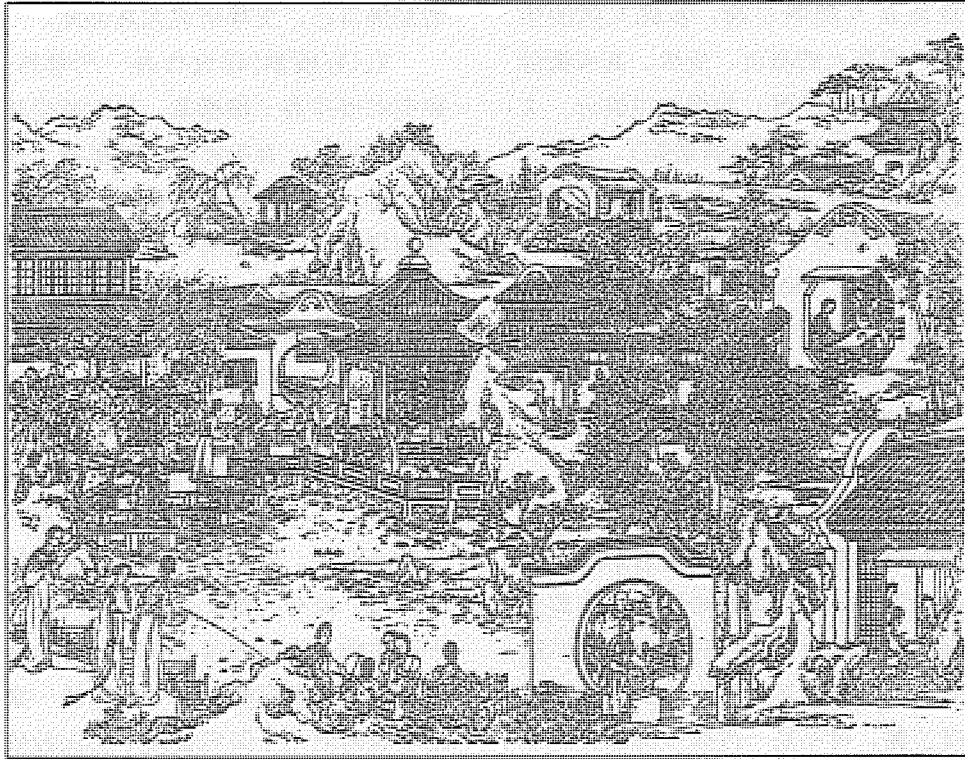
對一門學科來說，研究了一百年，在許多問題上還不能達致比較一致的結論，甚至形成許多死結，我想無論如何不能說是這門學科興旺的標誌。所謂真理越辯越明，似乎不適合《紅樓夢》。倒是俞平伯先生的「越研究越糊塗」^⑫，不失孤明先發之見。我把《紅樓夢》與百年中國聯繫起來——百年中國也是欲理無序，曲折萬端，可能也潛蘊着許多未解之謎。《紅樓夢》研究扭成了許多死結，百年中國也扭成了許多死結。話說回來，也許百年紅學的命運確乎與社會的變端真有一點甚麼關係？吾不知矣，吾不知矣。難言之哉，難言之哉！

下篇「百年頓盡追懷裏， 一夜難為怨別人」

二十世紀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。百年紅學也走到了百年的盡頭。世紀轉換，紅學將怎樣發展？紅學未來的命運如何？說來很不幸，以我個人的觀察，現在國內的紅學，多少有一點「禮失求諸野」的味道。比如多種版本的《紅樓夢》電影、電視連續劇的相繼問世。站在學術的立場，我無法認同這些視覺形象。又比如現在中國大陸，南北都在大建大觀園。紅樓服飾、紅樓宴大興其時。紅樓服飾雖有混淆明清兩代的迹象，但清代的特點還是明顯的。而清代服飾是否代表了中華傳統服飾文化的正宗？我頗表懷疑。唐宋裝是好看的，日人有所承繼，我們這故國，卻被清代「剃髮易服」而後隔斷了。1991年，康來新教授首創紅樓之旅，我隨喜着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懇談會。當時我被問及該怎樣看待這並不古老的「浪漫之旅」，我感到很不好回答。我想這創意是極佳的，也許有助於古典文學名著的詮釋與普及。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目叫〈紅學嚙語〉，文章的後半部分談的就是「紅樓」文化問題。我認為「紅樓」文化固好，但要避免俗世化。因為有人提出了「應用紅學」的概念。我說「應用紅學」如果也可以算作紅學的話，用得上史湘雲的一句話：「這鴨頭不是那丫頭，缺少二兩桂花油。」蓋缺少學術是也。

所謂「應用紅學」，不應該成為未來紅學的發展方向。

儘管如是，真正的、有學術價值的《紅樓夢》研究，仍在繼續中。受材料的限制，考證派紅學和索隱派紅學



很難前進了。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但小說批評派紅學不存在無米的問題。小說批評從本文出發，只要《紅樓夢》在，就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飯來。何況《紅樓夢》文本中，還潛伏着許多未解之謎，足夠睿智之士猜上幾個世紀了。不久前，鄧雲鄉先生透漏一條消息，說前些年有一次他從上海到北京看望俞平伯先生，兩個人閒聊，談到有人考證林黛玉是吊死的，因為太虛幻境裏黛玉的冊子上，寫的是「玉帶林中掛」。說到這裏，俞老先生非常嚴肅地問鄧雲鄉：《紅樓夢》第五十回，榮國府元宵開夜宴，寶玉離席回怡紅院，偷聽襲人、鴛鴦說話，然後又出園回到席上。半路寶玉要解手，跟隨寶玉的麝月、秋紋都站住，背過臉去，笑着提醒寶玉：「蹲下再解小衣，留神風吹了肚子。」俞老先生問鄧雲鄉：「寶玉為甚麼要蹲下來解手？」鄧是研究北京民俗的專家，他說北京兒童穿滿襠褲，站着撩衣露很

大一塊肚子，天冷吃不消，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來小解。問題本身自然小之又小，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，都無關宏旨。但《紅樓夢》研究者不同，就是探究得這樣深細。所以才出現許多紅迷。

總之，依賴於《紅樓夢》本文的紅學小說批評，前途是無量的。無論再過多久，人們仍然會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審美情趣，對《紅樓夢》做出新的解釋。每個時代的人，都有自己心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。社會的復興，文化的建設，總是伴隨着回歸原典的運動。《紅樓夢》作為一部文化經典，魅力是永存的，紅學不紅學，倒在其次。

當然現在的《紅樓夢》讀者，對作品的關注點與過去已有所不同。百年紅學的一個積極成果，是《紅樓夢》這部古典變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。不只《紅樓》，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、《西遊》等幾部具有典範意義的古典小說，一

由於受材料的限制，考證派紅學和索隱派紅學很難前進了。但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前途是無量的，因為無論再過多久，人們仍然會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審美情趣，對《紅樓夢》做出新的解釋。

直活在人們的心裏，參與人們的生活，成為人們語言、生活、甚或價值判斷的借用符號。如果加以區分，大體上少年兒童喜歡《西遊記》，老年人喜歡《三國演義》，農民喜歡《水滸傳》，知識份子喜歡《紅樓夢》。對《紅樓夢》中的人物，今天的讀者有不同的選擇。青年中喜歡賈寶玉、林黛玉的人越來越少，而王熙鳳備受青睞。《紅樓夢學刊》近年多次收到稱頌王熙鳳是時代新人的文章。

我自己也有這方面的經驗。十幾歲的時候讀《紅樓夢》，最喜歡的人物是晴雯。二十幾歲的時候，很欣賞史湘雲。現在想，《紅樓夢》中最了不起的人物，應該是平兒。給王熙鳳作貼身丫鬟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平兒作得很好。王熙鳳視平兒為心腹，其他的人，例如李紈，也說平兒是鳳姐得力的臂膀。平兒絕對沒有對鳳姐不忠實的地方。但王熙鳳做壞事，平兒絕對不做。不僅不做，她還要背着王熙鳳做好事，「相濟」而不「同惡」。平兒是維護鳳姐的，但鳳姐的罪惡，平兒卻沒有份。賈府上下沒有人說平兒不好的。我們可以設想，假如王熙鳳犯事，案情牽連平兒，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來作證，認定平兒無辜。做人做到如此地步，可以說達到了做人的一種極致。要說做人難，沒有比平兒做人更難了，但她做得最好。所以我覺得平兒其人最為難得。不過這樣的認知，須得有了一定的閱歷之後方能取得。就像《紅樓夢》裏平兒的思想風貌，必須經過「柳葉渚邊嗔鶯咤燕，絳雲軒里召將飛符」、「茉莉粉替去薔薇硝，玫瑰露引來茯苓霜」這些紛擾之後，然後方能在「判冤決獄」的大關目上顯現出來。

研究者從研究對象身上最終找到

的是他自己。文學研究尤其如此。

但《紅樓夢》研究作為一門學科，研究紅學作為一種職業，她的盛世恐怕是過去了。百年紅學已經極盡了學術之盛。現在的情勢有點像《紅樓夢》裏的賈府，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，內囊卻也盡上來了。1991年在新加坡召開的國際漢學會議上，我曾說紅學研究已到了「食盡鳥投林」的地步，而實際情形也確實如此。國內的紅學名家，近年續有新作的很少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，《紅樓夢》研究的偽考證之風趁虛而入。近兩年大陸紅學最轟動的新聞，是有人撰文說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寫得更好，其目的是翻五四以來顧頡剛、俞平伯等老一輩紅學家對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比較研究成果的案。再就是有人連篇累牘地寫文章，說現存各種脂硯齋評本都是假造的，企圖把五四以來新紅學的研究成果一筆抹煞。主張不應否定後四十回的功績是對的，早有不少學者這樣做過了，吳組緇教授於此持論甚堅。但一定要說後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寫得好，恐怕稍具文學鑒賞眼光的讀者都不會認可。至於脂本假造說，尤其缺乏堅實的根據。還有作者問題，近年對曹雪芹是《紅樓夢》原作者的質疑文章明顯增多，但也只是提出疑點，證據並沒有少許增加。因此這類紅學新聞，大半是「炒」出來的，輿情儘管沸揚，於紅學的學術進境卻鮮有小補。相反，這種炒冷飯、偽考證的行時，恰好說明作為一種學術思潮的紅學，已經到了梁啟超所說的學術衰落期，呈現出佛家所謂之「滅相」^⑬。

如果要我來展望世紀轉換後的紅學，那末我可以作一個比喻：已往的百年紅學，相當於《紅樓夢》前八十

《紅樓夢》研究作為一門學科，研究紅學作為一種職業，她的盛世恐怕是過去了。百年紅學已經極盡了學術之盛。已往的百年紅學，相當於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，從今而後的紅學，最多是後四十回續書而已。

回，從今而後的紅學，最多是後四十回續書而已。也許我的看法過於悲觀。不過沒關係，樂觀的朋友絲毫不必緊張，因為前面說了——現在不是正有人力圖證明《紅樓夢》後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寫得更好嗎？王國維在撰寫《紅樓夢評論》的1904年，也曾寫過一首《出門》詩，全詩八句寫道：

出門惘惘知奚適，白日昭昭未易昏。
但解購書那計讀，且消今日敢論旬。
百年頓盡追懷裏，一夜難為怨別人。
我欲乘龍問義叔，兩般誰幻又誰真。

我此時此刻草這篇論文的心情，和王靜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寫《出門》詩的心情，實相彷彿。我也不知我之所論，是接近「幻」還是更接近「真」？

1994年5月25日草訖

註釋

- ① 參見《陳寅恪詩集》（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126、127、107。
- ② 《太炎文錄初編·說林下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，第四冊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119。
- ③ 梁啟超在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嘗言：「凡真學者之態度，皆當為學問而治學問。」參見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（復旦大學，1985），頁40。
- ④ 參閱拙稿〈文化托命與中國現代學術傳統〉，載《中國文化》，第六期（北京三聯書店、香港中華書局、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聯合出版）。
- ⑤ 原載《雨僧日記》，收入《陳寅恪詩集》，載頁7，寫作時間署「一九一九年三月」。原詩第四句後面有註：「虞初號黃車使者」。
- ⑥ 《俞平伯論紅樓夢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1143。

⑦ 參見《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·紅樓夢卷》，第二冊（中華書局，1963），頁404。

⑧ 《紅樓夢辨》顧序所引，見該書頁4。

⑨ 王國維：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》，《靜安文集續編》，載《王國維遺書》，第五冊，頁65。

⑩ 陳寅恪：〈陳垣敦煌劫餘錄序〉，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238。

⑪ 請參閱拙著《紅學》（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334-35。

⑫ 俞平伯在《紅樓夢研究》一書的自序中說：「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，你越研究便越覺糊塗。」

⑬ 梁啟超論學術思潮，分為啟蒙期、全盛期、兌分期、衰落期，並以佛家「流轉相」之生、住、異、滅概括之。其論衰落期寫道：「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，陳陳相因，固已可厭。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，則先輩已睿發無餘，承其流者，不過摭摭末節以弄詭辯。且支派分裂，排軋遂之，益自暴露其缺點。環境既已變易，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，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，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。而豪傑之士，欲創新必先推舊，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。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啟蒙期，而此思潮遂告終焉。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，當佛說所謂滅相。」見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頁3。

劉夢溪 原籍山東黃縣，1941年生，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，中國文化書院導師，《中國文化》雜誌主編。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、現當代文學及文學理論的研究：已出版《文學的思索》、《文藝學：歷史與方法》、《紅樓夢新論》等論著多種。